



國家出版基金項目



任繼愈文集 1

任繼愈 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任继愈 著
本书编委会 编

任继愈文集

1

国家图书馆出版社



理学之渊源。理学者，宋明诸儒所著
理学之渊源本於洙泗，久成定论。自秦
餘年間，其全部思想及問題進展之歷程為
但詳人之所見，異人之所詳。疑似之言，
概不取。為明立論宗旨，異聞五義。一曰自
社名於，三曰辨析異同，四曰明宗要，五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任继愈文集/任继愈著;本书编委会编. —北京: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4. 12

ISBN 978 - 7 - 5013 - 5356 - 9

I. ①任… II. ①任… III. ①任继愈(1916 ~ 2009)—文集 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01362 号

书 名 任继愈文集(全十册)

著 者 任继愈著 本书编委会编

责任编辑 耿素丽 初小荣 贾贵荣 郭又陵

封面题签 冯其庸

封面设计 九雅工作室

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(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)
(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)

发行 010—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
66121706(传真) 66126156(门市部)

E-mail btsfxb@nlc.gov.cn(邮购)

Website www.nlcpress.com→投稿中心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装 北京盛天行健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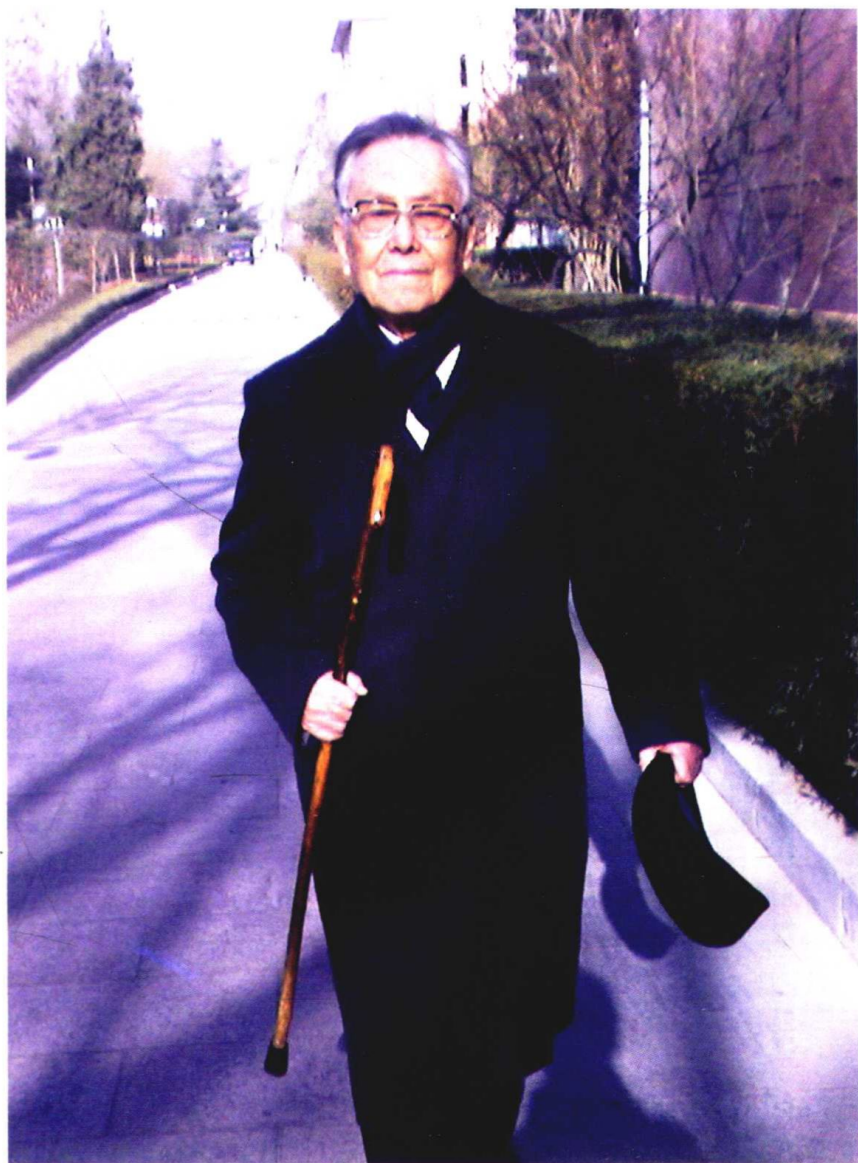
印张 293.5

字数 3620 千字

印数 1—1000 套

书号 ISBN978 - 7 - 5013 - 5356 - 9

定价 1100.00 元



任继愈先生（1916—2009）

理學探源

第一章

緒論



本文所論為探究理學之淵源。理學者，宋明諸儒所發揮儒家之學也。理學之遠源本於洙泗，久成定論。自秦漢以迄宋初，千餘年間，其全部思想及問題進展之歷程為本文所擬探討，但詳人之所異，異人之所詳。疑似之言，未定之說，概所不取。為明之論宗旨，要關五義。一曰自主自之，二曰社會性，三曰辨析異同，四曰明字要，五曰進展之序。

一自主自之。哲學思想即古人所謂道，所謂理。惟多

文化為歷史之民族無之。昏昏以生，昏昏以死，官樓而已，不知有他，此所謂東顧大於心死者也。瞻視往古，以旨益信。希臘精神照耀於歐洲，釋迦精神照耀於天竺，儒家精神照耀於中國。數千年來，此三支文化若三光之麗天，其自身雖各有晦明通塞，然世界文化淵泉，影響之廣大悠久，未有出於三者之外者。惟近世以來，印度衰，中國危，歐洲文化亦在其暴烈自戕之中。箇中是非得失，固不可一言而定，然其炳然數千年而不同於埃及巴比倫之曇花一現，此中道理大有令人長思深省者也。

蓋文化者，乃人類理智努力之總和而表現於外者。一

《任继愈文集》编委会

(以姓氏拼音为序)

杜继文 方广铝 郭又陵 贾贵荣 金宜久
金正耀 赖永海 李 劲 李 申 吕建福
潘桂明 任 远 任 重 习五一 徐 蜀
阎 韬 业露华 张新鹰

编委会秘书：李 劲(兼)

《任继愈文集》

国家图书馆工作委员会

主 任：周和平 韩永进

委 员：詹福瑞 常丕军 刘惠平 陈 力

张志清 魏大威 王 军 李虹霖

孙一钢 汪东波 张 彦 苏品红

方自今

《任继愈文集》出版感言

张岂之

《任继愈文集》的出版,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,也是人文学科中的一件盛事。

张岂之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为庆祝“世界文化发展日”做了“关于中华文化的问题”讲座,题目是《任继愈先生的学术研究》,其中给任先生的定位是“我国杰出的人文学者”。然后解释说:

“人文学者”是指从事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艺术等人文学科的研究者。我希望“人文学者”这个词能在我国普及开来,与“科学家”具有同等重要地位。

又说:

我心目中的任继愈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杰出人文学者。为什么说“真正的”?因为他的言行一致,严格要求自己,不张扬,不赶时髦,扎扎实实做学问,为人

师表,体现了我国当代人文学者的风范。

我非常赞同张先生的这个定位和评价。任先生的视野是宽阔的,思考是深邃的。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作为人文学者对于“天下兴亡”的关切与责任感,或许更加自觉,更加强烈,也更加深邃。因此,我们对任先生的研究也不能限制在什么“家”和某个特定领域上,自己给自己制造藩篱,障蔽自己的视线。张先生多次提到任先生提醒的一个论断:“‘多民族的统一大国’是中国的国情。”至少我本人就注意不够;有鉴于近来暴恐势力的猖獗,特别是结合学习习近平主席号召全党全国要为实现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”而奋斗,对任先生的这个论断更有了切身的感受,所以写了一篇专门的文章,有条件的话,也希望在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上做些讨论。

现在《任继愈文集》出版了,尽管不是全集,但对我们扩大视野、开辟研究范围,已经十分宝贵了。感谢编者和出版者,谢谢出版社全体同仁,你们做了件好事。借此机会,我想仅就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,讲几点感想:

从毛泽东到习近平,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与发展。人文学者的责任之一,就是如何去保护和继承发展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。在这个方面,任先生的贡献是巨大的,成绩单可以开出一大摞,而我以为最为重要的,是与之有关的几个原则问题:

1. 从抢救、收集到整理保存,任先生的原则是,不拘“精华”“糟粕”,宁滥毋缺,尽可能详尽地收集和保存起来再说。这是有惨痛教训的:从秦始皇焚书坑儒、楚霸王火

烧阿房宫开始,历次造反、“革命”无不把前朝的文化建设当作发泄愤怒、势不两立的对象加以摧毁;而中华文化历史之长,文物之多,积累之厚,按“物以稀为贵”的价值观,确实也难有去一一珍惜保存的动力。到了宋代,已经感到本国佛典流失之苦,而鸦片战争之后,才知道秦砖汉瓦宋版也是宝贝。上个世纪60年代,中央提出抢救文化遗产的要求,佛教是最重要的项目之一,在任先生着手编纂《中华大藏经》的一开始,就感到佛教汉文文献缺失的严重;当佛教的信仰和研究的需求同时高涨之期,不得不普遍使用日本版的《佛教大藏经》,真是令人汗颜:中国的传统文化,还得从国外回流!这个教训绝不可继续重复。这是任先生苦心竭力编纂《中华大藏经》及其《续编》的主要原因。这对我们看待和处理传统文化遗产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。

2. 传统文化遗产收集了,保存了,如何继承和发展就成了头等的大事。当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定性,可以说是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按说,这也正常;但若肯定下来,非要今人去接受不可,那就得辨一辨了。譬如,孔子的学说是否可用《弟子规》去概括作代表?向中小学生和孔子学院推荐是否恰当?就值得考虑。至少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,包括任先生的论著,这本书是没有地位的。不过我在读私塾时,老师曾教过我们。我十分尊重的这位启蒙老师,他在教授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之后,不教《论语》等四书,而是教《日用杂字》和《弟子规》。我理解他贯彻的是农耕为本、孝悌为先的祖训,是应该受到尊重的;但这些祖训是在外无侵略、内无苦难的小农经济和田园生活中形

成的一种世界观和伦理观,到了21世纪的今天,仍要孩子们去学习,去践行,立志做人,是要他们回归到二百年以前么?我们且不说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、巴金的《家》,就是看看共产党的领导层,以及大批涌入共产党的文化人,有几个不是反叛他的家庭和他的出身投身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的?再远一些,还可以看看早期国民党人的反清斗争。我不是鼓励大家去反叛家庭,泯灭亲情,而是反对误导我们的青少年一代,歪曲我们传统文化的本色。

3. 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:与西方比较,中国的传统是“天人合一”。首先,这个判断没有充分的根据。翻一翻任先生的《中国哲学史》,中国的哲学始终讨论的是“天人之际”的问题。这有两大派,一派主“天人之分”,最高原则是“制天命而用之”,民谚是“人定胜天”;另一派才是“天人合一”。这派中影响最大的是“天人感应”,要实现的是“君权天授”,民谚则是“听天由命”或“靠天吃饭”。此外还有一派,叫“天人交相胜”,可惜研究的人不是太多。如此看来,怎么会只有一个“天人合一”?原因之一,是“新儒学”的元老们发表的《宣言》就这么确定下来了,而“人体科学”的创建者更作为特异功能的理论基石,即使最著名的“国学”大师也是这样倡导的。然而,这不符合史实,也难说都是精华:现时的“相面”,早期流行的“骨相”迷信,都是把“天人合一”当作“哲学”依据的。

4. 从任先生的哲学研究中可以看出,中国的封建制度是比较稳定的,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形成的学术精神,却始终是维系和持续着我们文化生气的元素;魏晋以来形成

的儒释道三教鼎立与互补融合的主流,彻底防止了敬畏一个神、一部经、一种信仰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宗教迫害、宗教冲突的黑暗统治在中国的发生。这种多元化兼容并茂的文化传统,应该是我们五十六个民族联合形成中华一体的重要因素。

5. 现在有种颇为流行的观点,是道德滑坡,信仰危机。原因是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的批判、否定,断裂了我们作为礼仪之邦的文化遗产。这股风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否定是一致的,具有颇大的势力。但这也是唯心的,随意的胡说。我认为任先生的品格及其作风与学风,体现的就是“五四”新文化的精神。按毛泽东的解释,这种新文化的特质,是民族的,即爱国的;是科学的,即主张实事求是、客观真理、理论联系实际的;也是大众的,即民主的,走群众路线,为人民服务的。没有五四运动,就没有中国共产党,也就没有今天十三亿人口矗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共和国。而且事实也并非如他们所言,“五四”不是传统文化的断裂,恰巧相反,乃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更新。五四运动在政治上是爱国主义的,针对的是卖国主义、葬我民族文化的;在思想上发扬的是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”,“汤武革命,顺乎天而应乎民”。除旧布新是中华文化的生命力。一些人拼命诅咒维新革命,可谓无知。一些以传统名义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人,竟不知道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康有为的《大同书》、孙中山的“天下为公”,都有自己历史的根源《礼运篇》,而邓小平的“小康”社会,也是出自这篇经典——遗憾的是,许多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者,有意

或无意地忽视了这个出处,从而难窥邓公此言蕴含的特殊深意——它是复杂的,多元的,需要政治、思想、教育的积极跟进;它又是过渡的,不是我们民族最高的理想。

6. 这样,就有一个大前提必须解决:什么是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?我以为它应该包含两项基本内容:第一,是哪些思想精神从古至今贯穿于我们的民族历史之中,维系着我们民族的生存,激发着我们民族的发展,促进我们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?第二,这样的思想精神应该与人类整个文明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,领先的,但与其他民族、国家的文明相比,又是有自己鲜明特点的。我想,若有可能,任继愈研究会应该带头做些研讨,而且也希望出版社的同志仍然能给予支持。

最后还要再强调一次,任先生的全部研究,都是以他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。有人认为这是一大缺点,而我以为这是一大优势。有人认为,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去掌握马克思主义是被迫的“思想改造”,我以为这种“改造”是一种伟大的机遇,是冲破愚昧黑暗的封锁,进入独立创造的飞跃。这里可以引一段恩格斯描述马克思读到费尔巴哈《基督教的本质》一书时的心境:

这部书的解放作用,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。那时大家都很兴奋: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。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,而这种新的观点又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(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)!

凡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人,大都有过类似的心

境。我的佛学老师吕秋逸先生,就是把掌握马克思主义当作他的学术生涯的新生的,由此启发了他的灵感,推动他的佛学创新。那时他的欢快,在他为我们授课时都能流露出来。读读他的《印度佛学源流略讲》和《中国佛学源流略讲》,马克思主义对他的发现和发明有多大的助力,就可以知道个大概。众所周知,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最早的开创者,也是“新理学”的倡导者,但他坚定地留在解放了的北京,并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,用马克思主义反思自己过去的学术思路,直到晚年,还出版了他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——这也是“强迫”的产物?有学者把他的先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当作耻辱,删略有关文献,力图掩饰这一事实。这是不肖,是背叛。

老一代学者纷纷向马克思主义学习,在旧社会的严禁之下如此,在新社会提倡之下也是如此,说明这与政治背景无关,而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魅力:它不是信仰的教条、整人的棍子,而是开发人们智慧的科学。学习马克思主义使人聪明,作为传播和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出版社,光荣!

写在《任继愈文集》出版之际

詹福瑞

时间倏忽而过，任继愈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。

先生以九十三岁高龄谢世，不能说是天不假年，但是对于中国的学术界和图书馆界来说，对于先生的亲人朋友、共事同仁和晚辈学生来说，他的离去始终是永远都不能弥补的损失，永远都不能忘怀的沉痛。

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、宗教学家和历史学家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，中国哲学、宗教学领域中高瞻远瞩的学术研究领导者和优秀的学术活动组织者。同时，先生还是图书馆界最受敬仰的领导者，是图书馆界的一棵参天大树。先生在学界、馆界地位如此，生前却没有出版过文集或全集。原因有二：一是先生生前贯彻“三不”主义，不赴宴，不过生日，不出全集。我们想给先生过生日，先生一直不同意。先生九十寿辰的时

候,我说九十岁,这么大的一个寿辰,就是不过生日,给您开一个学术思想研讨会行不行?他坚决反对。任先生不出全集有他自己的理由,说别人的全集我都不看,因为全集把精华收进去了,不是精华的也收进去了,所以说还是不要出全集。当他病重的时候我也考虑图书馆给先生编全集,后来还是尊重了先生的意愿。第二个原因是,先生从来都把自己的事情看得很淡,很低,从来不拉着别人为自己的事忙活。在先生晚年,只要在京,我每周都去先生那里看一看,有幸聆听了先生的很多教诲。在先生九十多岁的时候,他说自己要写一部哲学史。他一再强调,自己要写一个哪怕薄一点的,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,但是他说我不能做,因为现在要做的文献整理工作还没有做完。文献整理是给后人打基础,因为他曾经预测,我们文化发展的高峰期、鼎盛期会在二十年以后出现,他认为我们这一辈人最应该做的就是文献的整理工作,为这一个高峰打基础。他说如果能活到九十六岁就够了,因为剩下的三年他就可以完成手上的工作,写一点自己的东西了!在坐镇国家图书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,先生先后主持编纂了《中华大藏经》,建国以来最大的古籍文献整理工程《中华大典》,主持出版了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等,去世前,他还在主持《中华大藏经续编》的编纂工作,可谓皓首穷经。然而,先生却将自己全集的出版放在了这些古籍整理项目之后。可见,先生是为了国家文化发展的理想而放弃了自己的学术计划,放弃了整理自己文稿的意愿。